

蒙古政教史

〔清〕耶喜巴勒登 著

苏鲁格 译注



蒙古政教史

〈清〉耶喜巴勒登 著
苏鲁格 译注

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 丁师瀚

封面设计 刘康峰

蒙古政教史

〈清〉耶喜巴勒登 著

苏鲁格 译注

民族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3 字数：80千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定价：0.74元

ISBN 7-105-00491-6/K·30

(汉文)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蒙古汗统传承	(12)
第二章 蒙古地区之佛教传播, 文字创制, 由汉、 藏文所译经典	(53)
第三章 建造寺庙之概况	(65)
附 录	(70)
关于《红史》、《王朝明鉴》及《青史》	(70)
《红史》节译	(71)
《王朝明鉴》节译	(77)
《青史》节译	(79)
《红史》、《史集》、《蒙古秘史》 所录蒙古世系之异同	(81)

前 言

《蒙古政教史》，原书名为《述说蒙古地区汗统、佛教、高僧、寺庙、文字创制诸源流之宝鬘》，简称《宝鬘》。

《宝鬘》成书于藏历第十四绕迥木羊年（公元1835年），系木刻藏文本，现存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作者是鄂尔多斯准格尔旗的耶喜巴勒登。

《宝鬘》一书分三个部分：一、蒙古汗统传承；二、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蒙古文字的创制经过，由汉、藏文所译之经典；三、蒙古地区建造寺庙之概况。

《宝鬘》对清代的盟旗建制和蒙古地区寺庙分布的记述独详，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史料。书中叙史部分的内容，与《黄金史纲》、《蒙古源流》、《黄金史》等十七世纪的蒙古编年史大致相同，但其中记载了许多不见于蒙、汉史籍的较为珍贵的片段。这些史料可补蒙、汉文献之不足，亦可与蒙、汉文献互相参证。例如：

小林高四郎在其《成吉思汗》一书中提出：“……然而楚材的名字，不论在蒙文史料上，还是在伊斯兰史料上，都少见，其原因未必是由于漠北人的反感，但却是奇怪的。”^①这一问题，在《宝鬘》中得到了明确的答案。《宝鬘》云：“封契丹族之名曰‘楚材’者，即主儿扯敦之‘楚·墨尔根’为诸大臣之首。”《蒙古秘史》中“主儿扯敦”之旁译作“女真”。耶律楚材，系契丹族，辽东丹王第八代孙，父祖以来服仕金国。蒙古灭金后，耶律楚材成为成吉思汗的重臣。从而使我们得知，蒙文文献中的“楚·

墨尔根”就是耶律楚材。

《宝鬘》对蒙古族源的记述，沿袭了《黄金史纲》、《蒙古源流》等十七世纪蒙古编年史的“印、藏、蒙同源”说，但因作者通晓藏史，为了与藏籍取得一致，把孛儿帖·赤那复原为涅赤。从而为我们查考“印、藏、蒙同源”说的来龙去脉，提供了线索。

印、藏、蒙并非同源，早已被公认。但是，关于“印、藏、蒙同源”说的来龙去脉，至今尚未见到完整的阐述。自陈寅恪《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一文发表以来，随声附和者不乏其人，皆说：“印、藏、蒙同源之说，盖八思巴《彰所知论》以降。”近年来，此说被许多文章引用，实有乘史实。故有必要明本正始，穷其原委嬗变之迹。

《彰所知论》云：“始成吉思汗从北方王，多音国如铁轮王。”陈寅恪注曰：“藏文‘多’为 mang-po，‘音’为 kpol。故以多音为蒙兀儿之译名。取其对音相近也。”②

上述引文的藏文以拉丁字母转写，即为：des byang phyogs nas brtsams te skad rigs mi geig pavi yul khams du ma dbang du byas nas stobs kyi vkhor los sgyur ba lta bur gyur to。意思是：“成吉思汗先统一了北方，而后征服了许多不同语种的地方。犹如铁轮王。”

文中根本就没有 mang-po 和 krol 二词。藏文 mang-po 确为“多”之意，但此段文中并没有用 mang-po 这个词，而是用了藏文中另一个表示“多”的形容词“du ma”。藏文“音”为“skad”（包括一切有意义和无意义的声响），“krol”并非“音”之意，而且藏文中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字。

所谓“多音国”，即“由操多种不同语言的人组成的国家”，与“征服了许多不同语种的地方”的含义相符，只不过是沙罗巴（《彰所知论》的汉译者）翻译时，文求对仗而已。

陈寅恪将“多音国”解释为“蒙兀儿”，并将原文中“始成吉思从北方王”的“王”字去掉，改为“始成吉思从北方多音国”，使横跨亚欧的蒙古大帝国变成了“北方蒙兀儿”。

《彰所知论》云：“北蒙古国，先福果熟生王，名曰成吉思。始成吉思从北方王，多音国如铁轮王。彼子名曰斡果戴，时称可汗、绍帝王位疆界益前。有子名曰古伟，绍帝王位，成吉思皇帝次子名孕罗，孕罗长子名曰蒙哥，亦绍王位。王弟名曰忽必烈，绍帝王位，降诸国土，疆界丰广，归佛教法，依法化民，佛教倍前光明炽盛。帝有三子，长曰真金，丰足如天法宝庄严。二曰朮鲁，三曰纳麻贺，各具本德。”^③

以上便是《彰所知论》中对蒙古的全部论述。乃从成吉思汗谈起，至纳麻贺止。既未追溯蒙古之族源，也未说“印、藏、蒙同源”。

“印、藏、蒙同源”之说，始见于《黄金史纲》，而集大成于《蒙古源流》。

《黄金史纲》云：“达赖·苏宾·阿勒坦·三答里图汗有三子，长子博罗出，次子锡巴古齐，幼子孛儿帖·赤那。因内部失和，孛儿帖·赤那北渡腾吉思海，来到札惕地方，娶了一个还没有丈夫的名曰‘豁阿·马阑勒’的女子为妻，在札惕地方定居下来，成为蒙古部落。”^④

《蒙古源流》云：“共主色格尔·三答里图汗历七世之后，称为达赖·苏宾·阿鲁·阿勒坦·锡日格图汗者，被大臣隆纳木谋害而篡其汗位。其三子博罗出、锡巴古齐、孛儿帖·赤那，俱各逃往他方，幼子孛儿帖·赤那出之工布地方。因彼工布国人不信，娶名曰豁阿·马阑勒之女子为妻，渡腾吉斯海，趋之东方，行至拜噶勒江畔之不岫罕·哈勒敦纳山，逢必塔国人众，彼等询其来由，遂以古印度之众戴王（即众敬王）及吐蕃共主之后裔语之，于是必塔国人共议之曰：‘此子有根基之人也，我等原无首

领，可立其为君。’遂推为君长，唯遵其旨意行事。”^⑤

《宝鬘》云：“若以佛般涅槃于丙寅年计算，则历一千零八十七年，藏王聂赤赞普诞生。其后裔，继天座七王之后，为上丁二王。此二王中，名直贡赞普者，为大臣洛昂所弑，洛昂窃政，自立为王，纳国王之女为妃，发落王后为牧马人。国王有名曰嘉赤、夏赤、涅赤之三子，逃往波布、娘布、工布三地。尔后，三子中之嘉赤，亦名布德贡结，复为吐蕃之王。末子涅赤，蒙古名称：‘孛儿帖·赤那’逃至工布地方，娶名曰：‘豁埃·马闼勒’之女子为妻。尔后，往蒙古地方，行至拜噶勒河畔之不岫罕·哈勒敦纳山下时，居于彼地之人众询问：‘汝从何处来？出自何种族？何因而来？’涅赤将其种族，从何处来以及出走之原因一一详述。彼称为‘必塔’之人众，遂尊其为君长，遵其意旨行事，共称其为‘孛儿帖·赤那’。”

在这里首先将以上有关人名分别作一核对：

(1) “色格尔·三答里图汗”系蒙文音译，藏文音译为“聂赤赞普”，二者都是“颈座王”之意。

(2) 直贡赞普，意为死于刀下之王，可能是后人根据其被大臣洛昂所杀而取名。但是，《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传记篇》云：“当直贡赞普年幼之时，如何上此王之名号，请问于老祖婆婆‘卓夏玛几林玛’，老祖婆婆问道：‘几地方之扎玛岩坍塌了没有？当玛地方的母牦牛草场被火焚烧了没有？登列维尔湖水干涸了没有？’人们回答：‘岩未坍，湖未干，草场亦未被焚。’当时，老祖婆婆年事高迈，耳患重听，错成‘岩已坍塌，草场焚毁，湖水干涸。’于是，说道：‘父辈溺毙水中，子孙也将遭水害，就取名为直贡赞普吧。’由于这种错觉，取了此名，王心中非常不悦，常耿耿于怀。”亦云：“（直贡赞普被洛昂杀害后）尸骸置于有盖能启的铜匣之中，抛于藏布大江之中央。流至江河尾端赛仓地方，鲁俄得白得仁摩之近旁。”^⑥

蒙文文献中将直贡赞普译作：“达赖·苏宾·阿鲁·阿勒琪·三答里图汗（锡日格图汗）”，意为：“海兆（后）金座王”，可能与上述传说有关。因为杜撰印、藏、蒙同源说者，意在制造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祖先，当然不愿接受“刀下死者”之名号。

（3）夏赤，“鹿座”（以鹿为座者）之意。故《黄金史纲》之“博罗出”当为“博古出”之讹误，即“骑鹿者”之意，为“夏赤”之意译。

（4）嘉赤，“鸟座”（以鸟为座者）之意。《黄金史纲》之“锡巴古齐”意为“骑鸟者”、“驯鸟者”。即“嘉赤”之意译。

（5）涅赤，“鱼座”（以鱼为座者）之意。《黄金史纲》等书将“涅赤”改作“孛儿帖·赤那”，孛儿帖·赤那，译言“苍狼”。既非“涅赤”之意译，也非其音译。此即杜撰“藏、蒙同源”说者偷天换日之所在。

勒石于公元八世纪末的工布第穆萨摩崖碑记载曰：“……直贡赞普之二子，长子名涅赤^⑦，幼子名夏赤^⑧。幼子夏赤承嗣圣神赞普，长子涅赤为工（布）噶波^⑨之首领。兄噶波者，自高处来时，向兄弟二人灵应之生命主神祈祷求福，并与第穆灵神^⑩婚配……”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传记篇》云：“（直贡赞普）二子，夏赤和涅赤亦被流放于工布地方……涅赤为工布之首领，夏赤为父王报仇雪恨事因，领兵三千三百而去……”

《王朝明鉴》云：“塞赤赞普之子直贡赞普，彼生有夏赤、涅赤、嘉赤三子。彼直贡赞普王，心被魔诱，令其大臣洛昂达孜曰：‘汝与我斗！’……王遂被弑。王之三子逃往工布、娘布、波布三地。……杀大臣洛昂，往迎三兄。夏赤与涅赤未能至，彼二人已为工布和娘布之首领，迄今彼地还有其后裔。从波布地方

迎回嘉赤……”^①

上述各记载，虽直贡赞普的儿子的人数及长幼位次不同，但均以涅赤为工布之首领，亦云：“涅赤与第穆灵神婚配”，“迄今彼地还有其后裔”。

由于《宝鬘》将孛儿帖·赤那复原为涅赤，据此可知，“藏、蒙同源”说并非出自藏籍，而是蒙古喇嘛所杜撰。盖蒙古民族皈依佛教，以间接受之于西藏之故。

《宝鬘》的作者声言：“桂·旬努贝所著之《青史》中云：‘成吉思汗诞生于水虎年，三十八岁即汗位，火猪年征木雅，水虎年歿。’与蒙古人自己的记载不一致，并且可汗之后嗣的人数、次第、相应年代亦不符。本书是依据蒙古人自己正确可靠的记载编写的。类似《青史》一类的蒙、藏文书籍中，难免有各种错误。即使是我们认为是最可靠的萨迦派著作和古昔之蒙文原著的记载，也可能有少许失误，但一般是可信的。”《宝鬘》中所说的《青史》，采用了藏文名著《红史》。而《红史》的作者蔡巴·贡嘎多吉声称，他的著述取材于现已失传的蒙古宫廷秘籍《也客·脱卜赤颜》。另一部藏文名著《王朝明鉴》指明：“格微罗迢（即《红史》的作者蔡巴·贡嘎多吉，法名格微罗迢）利用的《也客·脱卜赤颜》，是由真策·轨范师西饶耶喜于贡塘寺译为藏文的。”从元朝灭亡至十六世纪末的二百多年间，没有保存下一部蒙文历史文献，史学界将这一时期称为蒙古历史上的黑暗时期。因此，发掘当时译为藏文的蒙古史料，尤为重要！对于这一问题，很有必要作一专门论述。由于《红史》从蒙古宫廷秘籍《也客·脱卜赤颜》中，仅摘录了蒙古的世系，笔者将在后面对《红史》、《史集》、《蒙古秘史》所录蒙古世系之异同，作一比较，附于书后。意在抛砖引玉，为蒙古史的藏籍史料的进一步探讨和发掘提个线索。

《青史》和《王朝明鉴》均采用了《红史》，但又与《红

史》并不完全雷同。从版本学的角度看，很值得研究。故将《红史》、《王朝明鉴》、《青史》中涉及蒙古史的部分，一并译出，附在后面。对于探索《宝鬘》的史源，及《宝鬘》中提到的“古昔之蒙文原著”的著述情况和在藏籍中的存在形式，颇有裨益。

笔者翻译此书之目的，在于为学术界提供基本史料。所以重在忠实于原文，凡族名、人名、地名尽量采用汉籍中习用已久，约定俗成的用字，使其名从主人。但在翻译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有的明知有误，但又不便改正，只作了有关的说明。

翻译蒙古史藏籍史料，最大的困扰是藏籍中对“蒙古”的称谓问题。

藏文文献中对蒙古族的称谓有二：一为“霍尔”（hor），一为“索波”（sog po）。但此二词并非仅称呼蒙古。

“霍尔”（hor）一词，始见于八世纪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北方若干国君王统叙记》云：“往昔，霍尔（hor）王颁诏：北方究竟有多少国君？命五名霍尔（hor）人前往侦察……”^⑩。此文中之“霍尔”，并非蒙古，而是指回鹘。与此同时的古藏文文献中，也出现了“索波”（sog po）一词，《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编年史》云：“及至马年（公元694年），赞普驻于墨竹枕塘。伦芒辗细赞于苏布之寻巴集会议盟。噶尔·达古为‘索〔波〕’（sog）人所擒。”“波”（po）是藏文的后加成分，表示“者”、“人”，后加成分有时可以省略，“索波”（sog po），可径作“索”（sog）。这里所说“索〔波〕”人，有人认为是阻卜人，也有人认为是粟特人，迄今尚无定论。

萨班于凉州谒见润端后写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中云：“……要言之，此蒙古（霍尔）（hor）之军队多至不可胜数，瞻部洲已悉附于彼。从彼者则祸福与共，非真诚归附，阳奉阴违者，则不以其为臣属，且终必灭绝之。畏兀儿之境未遭涂炭，较

前益为昌盛，人畜皆彼等所有。文书官、财物官、僧官皆自任之。金、西夏、索波（sog po）等未灭亡之前，虽来朝贡，然不听命，终遭覆亡。后皆穷促归降为臣属。”^⑬

此文中，始以“霍尔”称呼蒙古，并将后来藏族称呼蒙古的“索波”与蒙古（霍尔）区别开来。这里所说的“索波”，似指被成吉思汗征服的塔塔儿（即《辽史》之“阻卜”，《金史》之“阻鞑”）。

此后，蔡巴·贡噶多吉著《红史》（成书于1363年）。桂·旬努贝著《青史》（成书于1358年）。萨迦·索南坚赞著《王朝明鉴》（成书于1388年）等藏文著作中，均以“霍尔”称呼蒙古。

十七世纪以后的藏籍中，“霍尔”和“索波”均指蒙古。但，有时也会出现特例。例如：

《汉区佛教源流记》云：“霍尔（hor）之世祖·薛禅汗（即元世祖忽必烈）……”^⑭，“圣勒坦汗的时候，《大般若经》等许多藏文佛经译成了索〔波〕（sog）文（蒙文）……”^⑮。显然上述之“霍尔”和“索波”皆指蒙古。但书中亦云：“成汤发兵四路，灭诸酋长，囚桀王，自立为王。给桀王之一子封于领地。……其幼弟避居北野，子孙繁衍，是为‘索波’（sog po）。”^⑯

《史记·匈奴列传》云：“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又《索隐》乐产《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迁徙，中国谓之匈奴。”

据此，上述之“索波”当译为“匈奴”。

《宝鬘》在叙述蒙古佛教之由来时云：“汉武帝时，汉军与霍尔（hor）交战，从霍尔之物品中获得一尊佛像，故霍尔盛行佛教早于汉地。”

《魏书·释老志》云：“案汉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

泉兰，过居延，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

据此，明知上述之“霍尔”（hor）是指匈奴，但原文是在叙述蒙古佛教之由来，如译作“匈奴”，反倒令人难以理解。尽管匈奴是蒙古人的说法早已陈旧过时，然而为忠实于本书的原意，只好随之。

翻译蒙古史藏籍史料的第二大困扰是译名问题。一名之考订往往需要踟蹰数日，必须用蒙、汉文献的记载进行比较考究，方不致发生讹译。例如：鄂尔多斯达拉特旗贝子喇什札木素，藏文原文为 bkra shis rgya mtsho，若按其藏文读音译为“扎西嘉措”（义译为“吉祥海”），治史者就很难确定其为何人。也就失去了译文的史料价值。

已故郭和卿先生在其译的《青史》中把“巴塔赤罕”译作“帕尔齐梗”，“孛端察儿·蒙合黑”译作“孛端义儿谟梗”，将“伯升豁儿·多黑申”误作两个人，译为“坝伊辛”和“柯尔脱辛”^①。这种毛病一则是由于不太通蒙古史，但主要是因为藏、汉对音颇难证合所致。故笔者尽量多作一些注解，以为译文之补救。

注 释

- 〔1〕小林高四郎著，阿奇尔译《成吉思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9页。
- 〔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24页。
- 〔3〕《大藏经》，频伽精舍本，传记部，致十，《佛祖历代通载》第二卷，《彰所知论·器世界品》。
- 〔4〕留金锁校注《黄金史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蒙文版，第4页。
- 〔5〕萨囊彻辰著《蒙古源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蒙文版，第115页。

- [6] 王尧辑《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青海民族学院1979年印，第30页。
- [7] [8] 常风玄将涅赤（聂弃nya khyi）译为“鱼狗”，将夏赤（夏弃sha khyi）译为“鹿狗”。（见《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42页。）
- 王尧注曰：“nya khyi, sha khyi, 相当于nya khri, sha khri。盖工布方音。khyi=khri, 至今犹然。”（见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03页。）并且后世藏籍均作nya khri, sha khri。故此处之khyi 当以 khri 译，即“座”之意。
- [9] 工噶波 “工”，即工布地区之简称；“噶波”意为白色，为工布之色尚。
- [10] 第穆灵神 王尧注曰：“‘第穆’，原属当地原始崇拜的神祇，在当地是颇为重要的崇拜对象。”（见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00页。）
- [11] 萨迦·索南坚赞著《王朝明鉴》，民族出版社1981年藏文版，第55—57页。
- [12] 陈践、王尧编注《敦煌本藏文文献》（藏文版）第279页。
- [13] 全文见《萨迦世系史》（藏文版）第78—81页。
- [14] [清] 贡布扎布《汉区佛教源流记》，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藏文版，第79页。
- [15] 同上书，第264页。
- [16] 同上书，第26页。
- [17] 见郭和卿译《青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37页。

苏 鲁 格

1986年元月于内蒙古社会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南无智慧之怙主至尊文殊师利^①，
 南无慈悲^②之怙主观世音菩萨^③，
 南无力之怙主金刚手菩萨^④，
 南无密教三部^⑤之怙主宗喀巴。
 顶礼诸法王、班智达^⑥、证果者^⑦，
 是你们以殊胜意乐^⑧之日轮，
 引佛法之大圆镜^⑨，
 至此黑暗笼罩之大蒙古。

注 释

- 〔1〕智慧之怙主至尊文殊师利 《心地观经》云：“文殊师利大 圣 尊，三世诸佛以为母，十方如来初发心，皆是文殊教化力。”大乘 菩萨以文殊师利为智慧之首，故称其为智慧之怙主。
- 〔2〕慈悲 佛教术语。《大乘义章》云：“爱怜名慈，惻怛曰悲……慈能与乐，悲能拔苦。”
- 〔3〕慈悲之怙主观世音菩萨 《法华经》云：“苦恼众生，一心称名。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以是观世音。”
- 〔4〕金刚手菩萨为密宗金刚部之怙主。
- 〔5〕密教三部 即佛部、金刚部和莲花部。
- 〔6〕班智达 精通五明者（五明：声明、因明、工巧明、医方明、内明）。汉籍中亦译作“班第达”。
- 〔7〕证果者 修学佛道有特殊证悟，获得殊胜成就或共通成就者。
- 〔8〕意乐 佛教术语。意得满足而悦乐。
- 〔9〕大圆镜 《心地观经》云：“转异熟识得此智慧，如大圆镜。”

摄取古昔之史籍释典，略述蒙古之汗统、佛教、高僧、寺庙、文字创制诸源流于下。

第一章 蒙古汗统传承

在此先述蒙古汗统传承：

自最初之玛哈三未多王^①，即众敬王^②，历一百一十二万一千五百余王朝后之丙午年，吾祖师释迦牟尼佛降临于赡部洲^③，宣示十二行相^④。

若以佛般涅槃于丙寅年计算^⑤，则历一千零八十七年，藏王聂赤赞普^⑥诞生。其后裔继天座七王^⑦之后，为上丁二王^⑧。此二王中名直贡赞普者，为大臣洛昂所弑。洛昂窃政，自立为王，纳国王之女为妃，发落王后为牧马人。国王有名曰嘉赤、夏赤、涅赤之三子，逃往波布、娘布、工布三地。尔后，三子中之嘉赤，亦名布德贡结，复为吐蕃之王。末子涅赤，蒙古语称：“孛儿帖·赤那”^⑨，逃至工布地方，娶名曰“豁埃·马阑勒”之女子为妻^⑩。尔后，往蒙古地方，行至拜噶勒河畔之不岫罕·哈勒敦纳山下时，居于彼地之人众询问：“汝从何处来？出自何种族？何因而来？”涅赤将其种族，从何处来以及出走之原因一一详述。彼称为“必塔”^⑪之人众，遂尊其为君长，遵其意旨行事，共称其为“孛儿帖·赤那”^⑫。

孛儿帖·赤那有二子。长子名曰“巴塔斯罕”，幼子名曰“巴塔赤罕”。

幼子（巴塔赤罕）之后裔依次为：

塔马察

豁里察儿·篾儿干

阿兀站·孛罗温勒

撒里·合察兀

也客·你敦

萨木苏齐^⑬

合里·合儿出

孛儿只吉歹·篾儿干

脱罗豁勒真·伯颜

脱罗豁勒真·伯颜之妻名曰“孛罗黑臣·豁阿”。孛罗黑臣·豁阿生都蛙·锁豁儿和朵奔·篾儿干兄弟二人。都蛙·锁豁儿额上生有一只眼。朵奔·篾儿干娶豁里·秃马敦部落之美貌女子阿阑·豁阿为妻，生二子，一名别勒古讷台，一名不古讷台^⑭。朵奔·篾儿干卒后，其妻阿阑·豁阿于夜间梦一白色俊秀天子来会，遂感欢快而有身。如是，寡居期间，又生不忽·合答吉、不合秃·撒勒只、孛端察儿三子^⑮。三子之后嗣分别以合塔斤、撒勒只兀惕、孛儿只斤为姓氏。

孛儿只斤氏之首，孛端察儿者，乃天之子也。《堪钦利吉多杰传》中云：“河源在雪山，人种源于天。”确切地示以真谛，故共许之。

瞻部洲之人，最初来自天界。尔后，亦有许多来自龙、夜叉、阿修罗等处者。

因孛端察儿生于朵奔·篾儿干卒后，故无疑并非朵奔·篾儿干之子，乃如上所述之天人、天种众敬王之后裔也。

孛端察儿成年后，曾一度与其二兄不和，故母亲给后三子分家产时，仅分给末子孛端察儿一匹劣马，别无他物。孛端察儿不乐，遂往他处而去^⑯。后来与二兄和解，孛端察儿娶了名曰“勃端”之女子为妻。并于一无首领之地方做了君长。他仁慈地扶助属民，日趋财富力强，并以其英勇气概开疆拓土，扩展势力。

天子孛端察儿之子合必赤·把阿秃儿。

合必赤·把阿秃儿之子伯克尔·把阿秃儿^⑰。